



——前新加坡驻日本、南朝鲜
特命全权大使黄望青教授
论日本、新加坡
经济发展之奥秘

陈锡礼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 016 6212 9



前新加坡驻日本、南朝鲜
特命全权大使黄望青教授
论日本、新加坡
经济发展之奥秘

陈锡礼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他山之石》这部选集出版问世了。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向广大读者推荐它！

这部30余万字的选集，搜集了黄望青教授的51篇论文、50幅工作活动照片，还有介绍他的政绩、简历等。本书生动地叙述了日本、新加坡经济起飞的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反映了这位外籍华人作者几十年艰苦奋斗，成为东南亚著名经济学家、新加坡卓越政治活动家的伟绩；充分体现了海外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寄予的无限深情，为促进中、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增进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立下了丰功。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势态动荡不安。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维护、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国家现代化经济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只有这样，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才能充分体现，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为此，我们需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益于我们建设的经验。《他山之石》这部选集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为何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成功的奥秘在哪里？新加坡经济发展速度在亚洲数一数二，对于它怎样崛起，同样引起人们深思。这正是黄望青教授在这部选集中主要回答的两个问题。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恢复战前、追上西欧、超越西欧这三个阶段。它超过西欧，跃居资本主义第二个经济大国的时期，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它的经济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用黄教授的话来说：日本“一面从西方学习了现代科学技术，一面却保持而且发扬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明治维新的基本政策是：日本文化为体，西方科技为用，事实上在过去一百一十年中，你们已经成功而且巧妙地把两者配合起来，因而创造了一个你们自己独特的国家。”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文化，流传到日本，至今仍保留于日本。他们的“文化为体”，实际上承继了历史上中国的文化；他们的“西方科技为用”，则是提倡“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而且加以发展。

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日本民族叫“大和民族”。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在东方，欧美在西方，其间以洋相隔。所以日本以本国文化为体，西方科技为用的另一说法叫“和魂洋才”。二次大战结束时的日本是一片废墟，这几十年来，它的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国民思想上强化了“和魂洋才”的口号，而且把这个口号渗透到经济领域的一切部门，从而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现已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二个经济大国。

现实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都有自己的特色。从《他山之石》一书的论述中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日本的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模式，新加坡的经济的发展则是另一种模式。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也是一个一个小国。它的陆地面积约有600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自然资源贫乏，几乎没有矿藏，甚至吃水也要从马来西亚引进。早在上个世纪整个东南亚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时，新加坡便成了东南亚的国际贸易转口港，经济十分落后，国内面临贫困、失业、人口过剩等许多困难。新加坡摆脱了帝国主义统治获得独立。以后这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很快，有亚洲“四小名旦”之一的称呼。本书中黄教授专章论述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之处颇多，这里依其个人之见解可以这样认为：他们从本国的

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因时制宜，充分发挥地理条件的有利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迅速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对策；并注意安定国内，协和万邦，保障开放，以谋求本国经济高涨。具体说，他们把发展经济的着眼点，放在向海外开拓上。大力发展海运和贸易的同时，注意引进外资，有重点、有选择地建立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开展相应的技术服务、旅游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他们的资金、技术、原料取自海外，市场也寄托于海外，从而形成特殊的经济结构，加速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进程。

《他山之石》这部选集，全书由日本成功之奥秘；新加坡的崛起；新加坡与日本的经济关系；经济随笔；访华演讲等五大部分组成。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是阐述新加坡如何学习日本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以达到本国经济崛起的见解。本书各篇文章，立足新国，善取日本，重在经济，讲求实效；论证深刻，高瞻远瞩；语言简洁，生动活泼；真知灼见，引人入胜，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本书作者黄望青教授所发表的许多著名于世的经济论著，均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战后的东南亚国家，纷纷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先后独立。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摆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面前的首要任务，一是政治独立，二是经济自立。即使有了政治独立，如果没有经济自立，这样的政治独立也将失去保障。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谋求本国发展经济的道路，其中新加坡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地处东北亚的日本，一改战前经济衰败贫穷的面貌，一跃而为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大国，这便引起了新加坡极大的兴趣。正是在这一时期中，新加坡选派了黄望青这位精明能干，博学多才，精通中、日、英三国语言，具有坚实经济理论基础、丰富商场经验、敏锐洞察能力、善说善写超群的外交家、实干家出任了日本大使，自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极为深知。黄望青教授在日本长达八年之久，为促进新、日经济合作和新加坡本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经济论著，

就是他工作的记录，汗水的结晶，生活的写照和功绩的再现。

黄望青教授的写作生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他早期以文艺创作闻名，后期以经济论著为主。近二十年来，他将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学术研究机构 and 国内外官方、半官方、民间组织和经济团体的各种集会上发表的专论和演说词，辑为中文四册，英文二册，日文一册而成经济论文集在国外出版。《他山之石》这部选集的文章，大多数选自黄望青教授的原著《从经济角度来看东南亚华人的前途》（经济论文集之一）、《工商业现代化诸问题》（经济论文集之二）、《经济外交在樱都》（经济论文集之三）、同名著作《他山之石》（我所认识的日本）之中；还有少数，诸如“访华演讲”栏目内的六篇文章，则来自作者访问我国期间的部分专题报告文稿；“作者简介”是选自宋哲美著，香港九龙东南亚研究所出版的《星马人物志》一书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本书中可以看出，战后日本、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虽然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但其发展速度很快，这确是一致的。其原因，至少可以归纳有四点：其一、抓资本积累：高度重视发展适应性很强的生产，大力使用现代化科学技术设施，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其二、抓人才培养：除大力投资教育经费之外，还建立有一整套国民教育制度和各级各类生产技术人员严格管理制度；第三、抓对外开放：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弥补本国之不足，借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不闭关自守；其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如果世界处于动乱之中，哪还有经济发展的可能。这些方面，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学习、借鉴，当然应有他正确的态度。正如本书“学习日本”座谈会上黄望青教授所说：“日本的成功是有选择性的接受现代西方的观念、制度，并加以配合，而不是盲目的学习”。日本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并非“全盘西化”，而保留了很多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我们东西。学习外国的经验，应是那些有助于我国建设的成功经

验,而绝不是全盘照搬。

本书可读性强,实用面宽。可供我国广大外事工作者、经济工作者、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师生以及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学习参考。

《他山之石》这部选集的问世,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首先是作者黄望青教授在本书选编的过程中与编者密切合作,保证了出书工作的顺利进行。另外,特别要说明的是,四川省政协领导李培根同志,在百忙中过问此书编选情况,还特地约请了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经济学家王叔云教授为本书作序;省政协外经办负责人陈锡文同志为介绍本书,撰写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四川日报》上,满腔热忱地赞颂作者黄望青先生的崇高精神。此外,西南师大美术系工艺美术专家傅孝修副教授为本书精心设计装帧;达县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同志不辞辛劳地赶出成品。在此,我竭诚地对他们,对一切关心本书出版的同志们、朋友们、同胞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陈锡礼

1987·3·1

序

· 王叔云 ·

新加坡前驻日本兼南朝鲜大使黄望青教授论述日本和新加坡经济崛起之奥秘的经济论文集《他山之石》在我国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事。这本书的出版不仅能为我国人民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结合国情创造性地学习他国成功的经验提供有益的借鉴，而且也必将对于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加深了解，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促进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际间以政治军事为主的角逐已渐渐转向经济技术的角逐，新技术、高技术已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主控权的争夺已成为国际间争夺的重心，经济力量在这番争夺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不发展，在世界上就难以取得令人羡慕的地位，也就难以得到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

但是，在这“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经济舞台上要想占据一个相当的地位，担任一个合适的角色，究竟靠的是什么？靠机遇还是靠自身的努力？机遇之来，似不可测，而且稍纵即逝，若不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即有机遇，也难把握。以日本为例，日本在战后废墟上崛起为“超级经济大国”，靠美援、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期庞大的美国订货的“机遇”，但更靠他们善于把西方科技和东方文化结合，靠他们领先的国民教育水准和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若

无这些,机遇再多,也难利用。日本崛起重要的一条是他们善于采众家之长为己所用,并迅速创造出更新更高的实用技术;新加坡起飞重要的一条也是他们善于学习别的民族有益于本国的经验,采取可用者而行之,这不但使它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使它在某些方面例如美化净化环境方面还有赝赝乎后来居上之势,超过了它所追赶的目标。

日本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都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取得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必须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国内大体已有一致的见解,这里不去说它。倒是日本和新加坡在建设具有各自特色的现代经济中的一些作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他们并不是搞“全盘西化”,相反,作者认为“日本的成功是有选择性的接受现代西方的观念、制度,并加以配合,而不是盲目的学习”。日本长期受中国的影响,但却把以“仁”为中心的中国儒家文化改造为以“忠”为中心的日本儒家文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日本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也就是作者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日本成功的秘诀在于东方文化与西方科技的紧密结合,亦即要搞以日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取得很大的成功。作者认为新加坡应向日本学习,但同时也明确指出“新加坡学习日本也应强调不是盲目的学习,不是日本人做的都是对的。”表现了这种学习外国的清醒态度。在日本儒家文化中,忠诚、孝顺和对长者的义务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价值体系,它调节着以权威、血缘纽带和年龄为基础的社会内部的等级关系。在日本的大企业里,首先以入社年限,其次才是以个人才干为顺序进行提升,所以在那里,职位表露年龄,年龄暗示职位,这种终身雇佣制度把职工紧紧捆在一起。作者态度鲜明地表示这种制度不适合新加坡的国情,他指出,在日本“必须尊敬长辈和上司,必须耐心地等待升迁的机会。不过,这种人事政策在新加坡恐怕行不通,对于那些具备良好资格和相当经验的优秀人员,尤其不合。要培养他们的忠诚,激发他们的努力,最好的方法就是

给予适当的鼓励,及时的升迁,即使升至经理之级,也是应该的。”此外,新加坡吸取日本发展经济中环境污染的痛苦教训,努力建设花园城市取得成功,赢得世界各国的交口赞誉。作者表示,新加坡原有多元文化的根基,通过健全的教育切实配合东西文化精华,才能实现新加坡的繁荣。这一番意思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986年12月26日对《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中讲得十分清楚:“我们尝试结合美国人那种具有创见、创造力和生产力的特性,我们也尝试学习日本人的经验。但我们之中绝大部分人应该保持我们的特性,而不是象美国人或日本人。”他提出学习外国不能忘掉本国特性,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的确至关紧要。

日本和新加坡的共同点是缺乏自然资源,但却都在发展经济方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新加坡人时时提醒自己,他们的国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就连淡水也得由马来西亚供应,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每一个国民的头脑和两只手”,但这样反而“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明白“如果再不争气,善加运用,简直连水也没得喝的。”因此新加坡对于智力资源的开发和运用极其重视,而由此建成了优良的交通、电讯、银行、保险体系等基础设施,这是有形资产,还有极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即作为传统贸易中心的良好声誉、从事国际贸易的丰富经验、遍及全球的广泛商业联系和日益提高的人民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水平等等。从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以地大物博著称于世。地大物博自然是优点,但如果对此缺乏自觉性,陷入了盲目性,丰富的自然资源就会成为思想上的包袱,反而影响我们更快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开始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盲目性,逐渐明确了:第一,自然资源再丰富,没有高素质的人去开发,仍只是一种潜在优势而非现实优势;第二,按人口平均计算,在许多重要资源方面,我们实际上是相当贫乏的。有了这样的自觉性,就会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这也是近年我国经济发展较

快的原因之一。

新加坡和日本的经验是认识经济到经济起飞关键在于重视教育。日本把受教育作为国民服役纳税之外的第三种义务，全民族高度的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使日本经济在世界上居于前列。新加坡也十分重视教育，作者指出，新加坡在人力问题上正以素质的提高来补偿数量的不足，由于缺乏天然资源，因此必须发展教育与训练，使人民的头脑和双手具有最大的生产能力和最高的工作效率，使其成为东南亚最苦干、最技巧的工人。新加坡十多年来大力推进全民科学教育、技术培训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值得重视的是他们规定小学生成绩不足以升中学者，送入职业学校，培养为技术工人；中学生成绩不足以升大学者，送入工艺学院，训练成技师或技师。这种多层次的教育培训培养出大批能够适应不同层次要求的各种人才，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这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民族关系不和谐，一场动乱将会葬送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作者在讲演中指出，新加坡政府“阻止甚至处罚任何种族沙文主义之过激行为”，因为“其他国家的痛苦经验已经明显地指证：这是引起不满，产生动乱，甚或造成灾祸的最容易和最严酷的途径。”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团结，强调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以保持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避免出现动乱。这使它的经济起飞有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当今世界，强手如林，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想在较短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国内稳定的政治局面、强有力的领导、高效率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任何动乱和折腾都将推迟、阻碍甚至破坏现代化的进程和高度民主社会的实现。认识到这一点，一定会增加我们对保持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关心。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作为新加坡华人的作者所表现的崇高的民族自豪感，这对于我们在开放过程中一些人的那种自卑、缺乏自

信心的猥琐心理也是一剂良药。作者认为日本人的成就说明西方也可以向东方学习，而他对华人在新加坡以至整个东南亚艰苦创业的充满激情的叙述却有力地表明了在亚洲日本人能做到的，华人在更艰巨的条件下也能做到——“我们华族”“在几百年来历经多少次战乱，面对数不清的困难，我们的祖先没有丝毫政治军事力量作后盾，披荆斩棘，自力更生，只靠自己一双粗大的手，一具精明的脑袋，一股坚定的意志，一对灵活的眼睛，竟建立了整个东南亚的江山，较之英、法、荷兰、西班牙的战舰军队还要坚强久远。”这段掷地有声的语言足以使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人愧汗满身。作者虽是外籍华人，但对中国的感情却是十分深厚的，处处表现出对中国的友好，他提出“经过百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难羞辱期间，历史注定内地和海外的中华民族子女应有密切的合作以求相互利益，同臻发达繁荣佳境，让我们不要错过这次空前的良机吧”。他在谈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无疑会在东南亚各国产生重大影响时，力主“海外的华族工商业者应该在当地发挥联络和调节的作用，以求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显示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这是非常可贵的。

“新加坡是一间陈列馆，用实例证明中华民族儿女们能够灵活地运用其智慧和能力，无中生有，创造出新的财富，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是作者自豪的语言，我们也能做到吗？我们回忆起著名华侨领袖，曾长期居留新加坡的陈嘉庚先生的一段话，他在谈及1940年5—6月去延安参观的印象时说：“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南侨回忆录弁言》），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无限敬仰。海外华族能够创造出经济奇迹，中华大地的优秀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

放,在学习外国经验时择其善者结合本国实际而行之,许以时日,也必定能够后来居上,赶超先进国家。

1987.2.1.

※※※※
※ 专 ※
※※※※

※※※※
※ 访 ※
※※※※

希望中国尽快腾飞 ——访外籍华人黄望青先生

· 陈锡文 ·

顾问教授

山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小礼堂内，座无虚席。礼堂边角的四周空地，也挤满了听众。大家都神情专注地听着台上一位外籍华人的讲演。讲演完毕，洪范副校长宣读了聘请黄望青先生为西南师范大学顾问教授的决定，并致祝辞，颁发证书，小礼堂内随即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位饱经沧桑、体格魁梧、穿着绿色花格衬衫的老人，激动得满眼泪花，不断挥动着双手，向听众大声回应道：“我是西师的人了，我在四川有归宿感了！”

黄望青先生，今年74岁，出生于福建厦门市鼓浪屿岛，193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50年前，他赤手空拳，背井离乡，漂泊到南洋，经过不懈的艰苦奋斗，成为东南亚知名的经济学家，新加坡卓越的政治活动家。1973年至1980年他曾出任新加坡驻日本兼南朝鲜特命全权大使；后又任新加坡广播事业局主席，多有建树，曾荣获

新加坡总统颁发的“高级勋绩奖章”。

由于黄望青先生在经济基础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因而，1977年，他被台北中华学术院颁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1984年厦门大学敦聘他为客座教授。此次，应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邀请来川旅游并讲学。

尽 快 地 发 展

笔者有幸在黄望青先生夫妇下榻的宾馆拜会了他们，并承蒙热情接待。

黄先生性格爽朗，嗓音洪亮。他一开口就说：“兄弟第一次来贵省，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如此资源丰富的宝地，是我们来川之前没有想象到的。”曾经同黄先生一道参加过抗日游击队的黄夫人也高兴地说：“在我们看来，四川简直遍地是黄金，只要努力开发，真是前途无量啊！这么美丽的地方，这么善良的同胞，我们都舍不得离开了。真想到峨眉山多住几天，盼望佛祖把望青和我点化成仙。”

在一阵欢笑声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世界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上来了。黄先生在日本出任大使八年，对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发展，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还通过出色的外交活动，从日本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为新加坡在七十年代一跃而为东南亚的“四小名旦”之一，出了很大力气。他说：“新加坡小国寡民，只约有600平方公里，200多万人口，物产稀少，1965年8月才独立，迄今没有多少年。新加坡百分之七十是华人，振兴靠什么？靠智慧和双手。”他十分理解要治理好有十亿人口的大国的困难。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年国庆纪念期间，他应邀到北京观礼，受到邓小平主任接见并合影留念。一谈到当时的情景，他就显得十分兴奋，说：“新中国强大了，所有海外的华人都会感到扬眉吐气。他十分赞赏中

国政府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认为这是一条充满了光明和希望的¹道路。黄先生满怀激情地告诉笔者，他盼望他祖先的国土，中华民族的十亿优秀儿女，尽快地发展，尽快地富裕，尽快地腾飞起来！

悲剧再也不能重演

黄先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习惯于在讲坛上作讲演。那怕对我这样一个听众，他也时而振臂，时而昂头，气势磅礴。当我们谈到日本时，他说，二次世界大战投降时的日本，只剩下皇宫和对面那座“第一保险公司”大厦，别的全烧光了。战败后的日本人，真所谓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呀。这是侵略者的结局。但是，五十年代后，在盟军撤退后不到10年的时光，日本便站立起来；而且再经10年，竟翻身变成使欧美瞩目的经济大国了。无怪乎人们把这称为“奇迹”。

诚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在日本出现的经济“奇迹”，在中国能不能出现呢？黄先生沉思了一阵，慢慢抬起头来，好象在自己答复自己，说，日本能办到的事情，我相信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不过“文革”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纵观世界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说明一个稳定、和平、团结的建设环境，是成功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他提出了一个建议，认为中国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参考、借鉴日本、新加坡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一是抓资本积累，二是抓人才培养，三抓对外开放。他特别提到，抓人才培养，必须进行思想教育、科技教育，提高人的素质。黄先生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无论才干和智慧，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流的，今天世界上许多重要的科技成果，都源于古老的中国。应该对年轻一代进行系统的历史教育，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先。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具有中华民族的特点。

一点心愿

当我离座，准备告别时，黄先生也站起来，握住我的手，恳切地说：一个民族要有点自己的特殊精神。他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一点相通的，就是不屈不挠、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日本人最可取的，就是善于学习外国的长处。他们的文化多半学自中国，科技来源欧美，然后把所学种种，作平衡的配合，自成体系。因此，他指出：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把东方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现代科技最巧妙地加以配合。

黄先生把我送出房门时，表示了一个愿望：打算把他的几部经济著作精选后，准备在四川出版，系统介绍日本和新加坡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供有关方面参考。黄先生一再客气地说，各国的国情有异，不能照搬，只供借鉴，也许毫无价值。不过，黄先生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愿；要是真能起到一点借鉴作用的话，这只是一个海外华人对祖先国土的一点小小贡献。笔者最近获悉，这部精选后的黄望青经济理论著作，已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完成，约30余万字，书名《他山之石》，即将出版发了。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2月15日第二版